

老七红着脸，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为自己辩解。我注意到，她脸上的盐霜又起来了。



三十年前，我在芜湖读书，离毕业还有一两个月时，心里感到异常烦躁。那个时候，我刚恋爱，男友在家乡的一所中学教书，那也是我曾经母校。我决定请几天假回老家一趟，心想最好要拉个“灯泡”陪着。

我决定找老七。

我对她说，想不想到天柱山玩啊？老七居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正是雨季，从芜湖到安庆，沿途天昏地暗，下着瓢泼大雨。天蒙蒙亮，在安庆下船，一路舟车劳顿，半上午快到县城时，雨居然住了，云开日出。

第二天一早，男友陪着我们登山。此时正是老历三四月的天气，可谓“桃柳明媚，山色如娥，温风如酒”。路上游人稀少，除了我们三个，几乎没见到人。上东关的路没有任何建设，连石阶也没有，很多地方我上不去，都是男友在前面拉着我的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来没见过山的缘故，老七异常兴奋，见我男友拉我，她也频频伸出手，要他拉一把。我开始变得不开心，但又不好意思发作。好在山上的景色确实太迷人，山石棱砺如骨，常有孤松盘郁其间；层崖古树，杂以各种野花，脚边常有急湍旋溪，如箭若奔；石上清泉，水落如银，不见泥沙。

老七越来越兴奋，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常常拽着我男友问东问

盐霜粒粒

葛良琴

西，下山时，遇到险路，她会大声惊叫，让他在下面用手臂支撑着她，然后开心地大笑，狂奔而下。男友虽然也顾忌我的面子，但也不好拒绝她，很为难地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我，有时故意等她走前面，拉着我的手走在后面。她那么开心，显得我不是安静，而是木讷，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到底是她给我当“灯泡子”，还是我给她当“灯泡子”呢。

我开始后悔了，在她“的大场”面前，我显得这样小气——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策划这样的“行动”。

半下午，我们在茶庄坐上返程的客车。老七还沉浸在兴奋里，丝毫没有注意我的情绪变化。车上人少，空位很多，男友一上车就坐到右边一靠窗的位子，身边留了一个空位，我本来想坐过去，但老七一个快步，在我前面坐了上去，我只好悻悻地坐到他们后面。她不时地回头和我说话，我注意到她脸上起了一层厚厚的盐霜。其实在下山的路上，我就注意到了，但我故意不提醒她擦掉，故意让她出洋相。此刻，车上气温更高，她脸上的盐霜更厚了，粒子也更大，看上去，就像饱霜的凤梨。更让我开心的是，她胸罩的带子松了，从短袖衫

的袖口滑落了下来。我将头偏向车外，心里有一丝幸灾乐祸。

男友偏回头找话和我说话，用眼睛示意我提醒她，我佯装没听见。后来，他大概有点生我气，或许也觉得这一路他并没有做错什么，而我却这样对待他，于是也开始不理我。他只好自己提醒她把脸上的汗擦一擦。

她的手臂上就这样一路拖着胸罩带子下了山。

在野寨下车，男友黑着脸，老七好像也意识到气氛有点不对，一个人走在前面，我们与她隔开一段距离后，就开始激烈吵了起来。我又羞又愧，但又不想低头，感觉面子上很过不去。我威胁他，当即赌气往相反的方向走，说要丢下老七，自个儿搭车回山里老家。这一着很见效，他当即示弱，好歹劝住了我。

我渐渐冷静了下来，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晚饭后，我独自出门拜访自己原来的班主任，回来时已经九点多了，在男友的房间门口，我没有马上推门进去，而是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他们正在下象棋，间或谈到我，男友说我脾气不好，这段关系让他很迷茫。我没有等老七接话，就推门而入。当晚，男友住

到学校招待所，我和老七睡在他房间，一个晚上，我都没搭理她。

第二天，我送老七去县城搭车，让她先回校，然后自己回山里老家。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看她上车，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车快开动时，我对她说，我要和他分手了，这下，你开心了吧。老七红着脸，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为自己辩解。我注意到，她脸上的盐霜又起来了。

毕业后，我和老七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在我的心里，始终感觉很对不起她，与她的不辩解相比，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小人”。挂在她脸上的盐霜，这些年，其实一直堆在我的心上。盐霜粒粒，粒粒都是我的不堪。



葛良琴，中学教师，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在《阳光》《安徽文学》《清明》《传奇传记文学选刊》《中国周刊》等发表。

这起谎言，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虚荣心有多强，我就有多丑陋。



所谓的“远方”，对于自小生活在市区的孩子来说，一定是北上广甚至是国外，但对于自小生活在离县城数百公里的乡下孩子来说，不过山村之外。

毕业的第二年，通过一场严格的公开考试，我顺利地踏进了安庆日报社，成为了一名小记者。来到了“远方”，有一份所学且所爱的职业，23岁的我，信心满满、无所畏惧地奔跑在一线，不知道“物业”和“业委会”是何物，我就花钱订阅《中国物业杂志》，新闻线索不来找我，我就壮着胆去各行各业负责人跟前主动自我介绍。这样的努力很见效，很快，我便熟悉了一些出新闻的“肥口”，每个月也总能写出比别人多一倍的新闻稿。但与此同时，我也隐隐约约感到了一层重似一层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经常会打断我原先拟定好的采访思路，甚至是打击我原本饱满的热情和自信心。

我开始感到一丝自卑。这自卑，来自于一次次采访中采访对象追问“你哪所大学毕业的”。

诚然，在那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我确实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也确实算一只通过寒窗苦读、艰辛考学而成功飞出大山的励志“凤凰”。但不得不承认，在安庆这样的教育大市，我一名二本学历的毕业生，委实不算什么。到菜市场买菜，或是打个出租车，跟对方多聊上几

谎报校名

毕 瑾

句，话题便会呈现同一走向——“我孩子跟你差不多大”，紧接着便是“他是北大（清华、复旦）研究生”，说“在国外留学”的也比皆是，更别说我经常接触的那些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了，他们几乎家家都有高材生。偶尔几人在饭桌上吃饭，也难免要被追问，待我被迫说出自己毕业的院校时，在别人的一句“哦”之后，我也习惯性地感觉到脸上有火辣辣的刺痛。我知道，我开始不以母校为荣。

是的，上一辈的人，即便读个中专，在那时候也是不多见的，自然含金量高，我这一辈的，不说本科生遍地即是，硕士博士也是常见的，何况我只是个二本院校毕业生。时间稍一长，我越发变得没有底气，开始疯狂删除QQ空间内别人可能看到的一切关于毕业院校的信息，关于毕业院校招生季、毕业季等的一切信息和视频我也只看不转，我开始向别人解释当年高考没有发挥好、志愿录取时又频频撞车，我开始后悔当初选择就业而放弃了读研究生……

终于有一次，我选择了“说谎”。当再有人问我从哪里毕业时，我居然说出了“XX大学”四个字。虽然这并不是我的理想院校，但我窃以为，

这样的学校给别人的印象至少不差。那一次心惊胆战的尝试，确实给了我不错的体验，我成功“逃脱”了别人不屑的眼光，也更加坚定了我“偷换”学校的决心。

刚好当时和我合租的室友是这所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我们平常也会谈谈关于大学关于专业的一些事，所以我对这所大学的新闻专业多少了解一点。有了第一次的安然“脱险”，我又惴惴然地尝试了第二次，第三次……如此应付几次之后，我心境大开，再有人追问，我也能自然应答。我暗自嘲笑自己，功夫练到家了，竟然连说谎也不会脸红了。

就在我觉得“渐入佳境”的时候，向来热心的T姐喊我小聚，到了聚会地点才知道，她是要给我介绍一位比我早一年毕业于这所大学新闻学专业的男孩子。当我知道这个信息时，T姐已经坐在身旁给我俩介绍完毕，她还特意调侃了一句：“‘直系’学长和学妹，话题更聊得开。”男孩子很健谈，根本没给我时间想出“脱险”的办法，只三言两语，我们便对不上了，一场谎言模糊剧正急速推进。不知如何回旋的我，死死盯着地面，仿佛盯久了真能裂出一条地缝让我钻进去，许

久未有的“不适感”再次袭上脑壳和脸颊，而这种不适直接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我找了借口，仓皇离开，竟连手机何时弄丢了也不知道。

此事之后，我想了很多。怎么说也是靠自己努力读来的大学，怎么说也在大学四年里锻炼了技能、交到了知己，怎么说也是一名靠实力考进报社的本科大学生，我为什么会觉得低人一等，会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和我的大学？也许，别人也只是出于一种礼节性的关心而已。更何况，人生的路还很长，不是一纸文凭就能框定前程的。

想来想去，作怪的是自己，是那点虚荣心，让我不能诚实地面对过往、接受现在，让我变得不够洒脱不够坦率。而这起谎言，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虚荣心有多强，我就有多丑陋。



毕瑾，本报副刊编辑。